

复旦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 编
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

复旦名师剪影

（医学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 委 会

主 任: 王小林

副 主 任: 钱冬生 张永信 方林虎 萧思健

执行主编: 刁承湘 王增藩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言雯	刁承湘	王小林	王增藩	方林虎
邵 瑜	张永信	陆士清	陆昌祥	金文英
金邦秋	杨慧群	钱冬生	钱益民	徐志伟
黄全娣	萧思健	萧辅玢	鄂基瑞	韩宗英

以“人”为本，叙说复旦

——序《复旦名师剪影》



《复旦名师剪影》编辑出版了，真是可喜可贺！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先贤们的叙述道出了大学的本质属性，即，道德、学问、大师和学生；同时，也使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来言说大学。

遗憾的是，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让人既恨又难以摆脱的倾向，即，各个学校均在各种场合列出了对本校有利的各类数据来叙说自己的学校。我也十分清楚，这样的定量叙述对有关部门还是很有效的，通常可以为自己学校换取诸多的实际利益。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大学里的“人”，即，教师和学生。或许，这是当今对大学的叙说存在的一大问题。这种见“物”或是见“数”而不见“人”的大学叙说方式是极具危害性的：它使得大学不如以前那样得到推崇，因为就“物”而言，大学确实没有太多值得羡慕的；它使得学校精神衰落，学术与利益结盟，使得其中的“人”也滋长物欲，一旦物欲未能得到满足，就大呼小叫地抱怨；它也使得学生的求学目的变得更加功利，而“物”化了的大学本身也对学生施加了功利性的暗示；它更使得作为大学里的“人”的教师和学生的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使得大家对大学教授、学生乃至校长的批评变得粗鲁、野蛮，有时甚至毫无理性可言；……恰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所言，“现在对大学的论述并不理想，导致我们拼命在上面涂鸦，导致我们没有精神家园。所以我想，要用什么方法让大家觉得现在的大学仍然值得期待。”

当然，大学的叙述方法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我认为，对大学里的“人”展开充分的叙说应该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就复旦大学而言，是复旦

人创造了复旦的历史,也创造了复旦的精神和传统;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使复旦的未来更加辉煌,是我们后辈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我提议编写《复旦名师剪影》,向复旦的教师尤其是学生讲述复旦名师的故事,并以此培养我们新一代的复旦学人。这里用“故事”二字有我的考虑:一是因为“故事”要比“校史展览”更加细致、具体,更加鲜活,也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学术活动;二是因为我相信“大学需要故事,有故事的大学才有魅力!”

我深感欣慰,我的提议得到了学校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教授协会”和“党委宣传部”等单位的积极响应,他们组成了编委会,汇聚了一批老同志开展辛苦的编写工作。读着这些书稿,这些老师的金色的名字一个个在我眼前闪过,所写的复旦名师的生动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复旦所以有今天的辉煌,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名师良师辈出,数以千百计。他们有的是杰出的教育家,有的是杰出的医学教学家,有的是科学家、学问渊博造诣精深的学者和文林的俊杰。他们忠诚于教育事业,在教学科研和医学教育的岗位上,燃烧自己,鞠育英才;他们在各自的科学和学术领域中开拓进取,引领风骚!他们的名字像一颗颗亮丽的星星闪耀在复旦的天幕上,镶嵌在共和国的科学、医学和学术史册中。这些闪光的名字是马相伯、颜福庆……他们一个个名字就是一座座学术的丰碑!我们要感谢复旦和上医的先贤,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使复旦有了今天!我们这些名师良师,不仅创造了卓越业绩,还给我们留下了足以传世的风范。

编委会将书名取为《复旦名师剪影》,我觉得非常恰当。既然称谓《剪影》,表明我们并不企图去勾画一个人的全貌,而只是对真实的人和事从某个视角进行投影;因为是《剪影》,其“投影”的视角完全由作者来选定,所以其不能被看作是一个人的传记;由于选取的投影的视角不同,故事的叙述也多彩纷呈,同一个人在不同视角下也显现出不同的风采。

或许有人会担心作者的叙述可能会因其主观看法而产生一定的“扭曲”或“夸大”。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独特的视角确实会产生对人和事的独特的叙述,但这也反映了作者对复旦学者应有形象的一种期待和“塑造”。同时,每一位作者均有自己独特的文风和叙事风格,对此也没有必要强求统一。或许,这样的方式叙述的故事才更易被大家所乐于传诵,并形成对复旦人的独特的记忆。

既然称谓《剪影》,我们也并非企图去对一个人作一个“鉴定”。金无足

赤，人无完人，“完人”不是确定编写对象的要素。人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对人的评价也会因人而异，所以“舆论一律”也不是选择的依据；编委会看重的是编写对象所创造的业绩和浸渍在业绩中的精神。本着这个原则，编委们既不回避编写对象的独特个性，也不故意“拔高”或“贬低”对象的某些方面，而更注重将一个真实的、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名师形象呈现给大家。

现在，《剪影》已经编写完成而即将出版，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它将成为我们复旦人的教材。我相信我们复旦的青年教师和莘莘学子，在细读这本书后将会发现，复旦人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复旦人？复旦人应该追求怎样的人生价值，建立怎样的人生坐标？我希望复旦的青年朋友们深思之、慎抉之，践行之。让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把复旦发展得更好。

我深知，编委会成员为《剪影》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此，我要代表学校对本书的主编、编委、老同志们和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复旦将牢记你们的贡献，并将此项事业不断地延续下去。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提供的支持！

是为序。

2013年9月22日

序

韩启生

一年前，刁承湘学友告诉我复旦大学计划出版《复旦名师剪影》一书，我十分拥护，并鼓励她承担执行主编的任务，因为复旦大学需要留下这样的历史文献，我也相信这本书一定会很精彩，对教育今人起到很好作用。现在这部书已经交付出版，承湘学友希望我为医学卷写序，我乐意为之。

收在这本书里的上医教师都是全国著名的大师、名师，曾经在各学术领域里独领风骚，为我国现代医学和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中国人的健康都受惠于他们的工作，相信医学界的同仁们看到他们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然而，给人留下更强烈、更深刻印象的，是他们身上闪烁着的人性的光辉。

我注意到上医这些名师都出生在 20 世纪初。他们看到过满目疮痍、任人宰割的旧中国，经历过战争的苦难和洗礼，也体会过要在落后腐败的旧中国发展现代医学的艰难。他们满怀激情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用自己的学识、智慧和辛勤汗水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医药卫生事业和医学教育体系。他们亲身经历了 20 世纪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伟大变革，他们与祖国共患难、同欢乐，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些名师中的多数人曾经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他们在那里受到了严格的现代科学教育和训练，在他们后来的实践中充分体现出可贵的科学精神。追求真理、尊重事实、缜密严谨、革故创新成为他们最集中和突出的品格。

这些名师在青少年时代都得到比较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都重名节，负责任；尊敬师长，爱护学生；勤俭敬业，乐善好施；淡泊名利，鄙夷虚华。中西优秀文化在他们身上得到融合，使他们具有温润而又富有个性的人格魅力。

这些名师在上医都有很高的威望，他们的言行自然会对周围的师生产

生很大影响。润物细无声,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上医正谊明道、严谨厚实的校风,成为代代相传的上医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身上的美德和崇高品格,已经成为上医的基因。在优秀上医学子身上,不管直接还是间接,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响。

今日之中国较之这些名师在世之时,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总在想,如果他们还活着,看到祖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繁荣富强,看到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该会多么欣慰和高兴! 如果他们还活着,看到今天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看到上医发展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们又会是什么态度和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斯人已逝,上医的后人应有担当,继承他们的遗志,栉风沐雨,迎难而上,力争有所建树。把上医建成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校是我们先辈们的理想,也应该成为当代上医人为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行动。

《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即将付梓出版,希望上医师生都能够认真读一读这本书,从而更加自觉弘扬上医的优良传统。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广大医学工作者和医学生所喜爱,从中汲取营养,让现代中国大地上涌现大批新时代的医学大师和名师。

2013 年 5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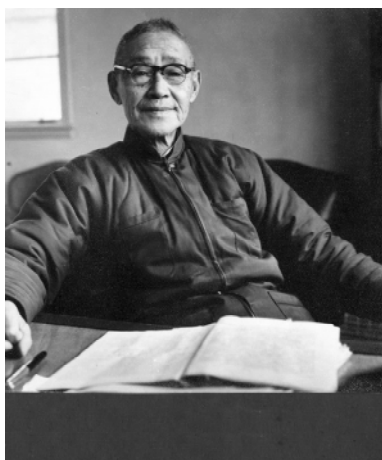
目 录

以“人”为本,叙说复旦——序《复旦名师剪影》	杨玉良(1)
序	韩启德(1)
为千万人提供“托命之场”——医学泰斗颜福庆	钱益民(1)
“正谊明道” 身体力行——上医老院长朱恒璧教授纪事	萧辅玢(9)
济世铸医魂——记吴绍青教授	李华茵(16)
办学兴业 造福民众——追忆宋梧生教授	宋涛能(21)
奋发有为 执著追求——忆谷镜汧教授	谷伯起(26)
大医精诚——记沈克非教授	王越琦(32)
孜孜以求,平易近人的生物学专家——缅怀张和岑教授	施大文(37)
为了中国的儿科医学事业——怀念陈翠贞教授	刘湘云(42)
为解剖组胚学科奠基——怀念王有琪教授	王蕙仁(48)
大爱无私 丰碑长存——忆王淑贞教授	王 珏(51)
跨越3个世纪的医学大家——杨国亮教授	孙国根(61)
医道传神 师德高尚——记胡懋廉教授	周建莹(70)
空山独夜向光明——记荣独山教授	吴 东(77)
别开生面创环卫——我们心中的杨铭鼎教授	袁 健(83)
楷 模——忆徐丰彦先生	姚 泰(88)
铭记师德 终生受用——记林飞卿教授	闻玉梅(95)
杨毅教授为我打基础	周智善(99)
愿将此身长报国——追忆郭秉宽教授	赵 婧(101)
他与上医同在——怀念陈同生院长	刁承湘 张浩青(106)
坦荡荡 上下而求索——忆预防医学家苏德隆教授	袁鸿昌(112)
大师的点拨——缅怀张昌绍先生	秦伯益(118)
碧血丹心献西南——忆钱惠院长	戴钟英(123)
大师情怀——黄家驷教授二三事	沈亚星(128)
内科元老 德泽医林——记林兆耆教授	张宁萍(134)
我国儿少卫生学的开拓者——记徐苏恩教授	汪 玲(140)
从实践出发 大胆创新——崔之义教授与真丝人造血管	汤钊猷(145)

大家风范——记熊汝成教授	朱廷军(148)
正正派派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朱益栋教授侧记	程立(154)
她将一生献给了肿瘤外科事业——记李月云教授	王懿辉(159)
谦谦学者 温润如玉——记何章岑教授二三事	余晓波 唐雅婷(165)
献身医学 崇尚简朴——怀念导师顾学箕教授	夏昭林(170)
一位重实践讲科学的妇产科专家——司徒亮教授侧记	戴钟英(176)
他为中国麻醉事业而生——吴珏教授侧记	金琳 仓静(181)
病理诊断的先行者与普及者——记顾绥岳教授	王懿辉(186)
住院医生的好导师——忆顾庆祺教授	郭怡清(193)
追思我的恩师——戴自英教授	张永信(197)
一切为了病人——记吴学愚教授	王薇(203)
中国精神医学先驱——夏镇夷教授	江开达 徐韬园(207)
徐达道教授对我的指导和培养	王加生(214)
一个“内分泌亢进”的美丽传说——记钟学礼教授	周丽诺 沈稚舟(218)
名医大家 良师益友——忆陶寿淇教授	诸骏仁(224)
“世界断肢再植之父”——陈中伟教授	邵云潮(229)

专稿

我们学生编辑出版了 <i>Intern's Pocket Book</i>	张金哲(236)
记忆中的上医	毛江森(239)
上医往事一二三	韩济生(242)
温馨的回忆	杨雄里(246)
难忘上医师生情	谢基立(249)
大教授的小故事——记苏德隆教授的几个小故事	俞顺章(254)
丰富 生动 严谨 温馨——感受沈克非老师上课	李华德(259)
我心中永远的灯塔——想念王淑贞院长	俞瑾(264)
怀念顾绥岳老师	陈忠年(270)
后记	王小林(272)



颜福庆(1882—1970),上海市人。教授,医学教育家、预防医学家。1904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曾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校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7年创建上海医学院并任院长至1938年。1938—1940年出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1949年7月起一直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九三

学社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名誉副会长等职。

为千万人提供“托命之场”

——医学泰斗颜福庆

钱益民

校歌,心声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可喜!可喜!病日新兮医亦日进。可惧!可惧!医日新兮病亦日进。

噫!其何以完我医家责任?歇浦兮汤汤,古塔兮朝阳,院之旗兮飘扬,院之宇兮辉煌。勗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

这是国立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的校歌,老上医莘莘学子传唱的一首慷慨激昂、豪情满怀而意蕴悠远的校歌。

这首校歌,由上医的缔造者颜福庆的好友黄炎培作歌词,徐希一谱曲。校歌以自问自答开头“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将为医、为人民消除病痛的意义提高到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层次上衡量。那么,人生、为医要不要求功,求利?回答是“勗哉诸

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这样的功利观,充分体现了颜福庆为医和创办上医的理念、追求和崇高的情怀,是颜福庆的心声。正是这种坚挚的理念和崇高的情怀,将他铸造成了中国的医学泰斗。

医生的责任是什么

历史给颜福庆的定论是“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似乎没有今人看重的重大发明和鸿篇巨制,他的价值往往会被遗忘。其实,他的业绩、他的英明是永垂的。

1910—1927年在湖南湘雅行医、办学期间,颜福庆曾经是一位出色的全科医生,尤其擅长精细的眼科手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机会继续在专科深造,成为外科某领域的专家。这实在是中国医务界的幸事。中国医务界少了一位眼科专家,成全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医学教育家和曾经统领整个中国医务界的领袖人才。在他的引领和教育下,一大批杰出的各科医学专家成长起来,例如湘雅医学院的高材生张孝骞、汤飞凡、高镜朗、吴绍青、应元岳、龙伯坚、董秉琦、李振翩、谢少文,上医的高材生林兆耆、杨国亮、张昌绍、苏德隆、钱惠……

药到病除,是民众对医生的普遍心理期待,一般医生也以开药方、治好病作为自己的责任。即使今天,依然如此。颜福庆坚信,医生的天职不仅是把病人的病治好,更要预防疾病的发生。他深刻地预见到,不,应该是理性地意识到20世纪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必须是重视预防医学,这是一个贫弱的泱泱农业大国的医学现状所决定的。他和伍连德、俞凤宾等中华医学会创始人在重视预防医学上是高度一致的。

早在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上,颜福庆就发表题为“医家之责任”的演讲,批评把治病作为医生唯一天职的旧医学观念。他在《黄帝内经》“上医治未病”的基础上阐述了“防病于未然,不仅在疗治于已病”的新医学思想。他认为治病只是医家众多责任之一,医生要分清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看门诊治病是近期目标;启发开导民众,宣传教育健康知识,使全体民众身心和谐健康,这才是医生的长远目标。也就是说,防病比治病更有意义和价值。没有预防观念,只满足于治病的医生,是还没有完全尽到医生的职责。心中确立预防观念并身体力行预防疾病,这才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医生,才是民众真正需要的社会福音。医生所从事的是“福国利民”职业,有其特殊的职业道德,不允许有世俗的“畏难心、苟(且偷)安心、登高垄断心”蒙蔽心灵而玷污医生神圣的职业。普通大众往往不明白预防医学的道理,要实

现公共健康,需要政府、人民与医界三者的密切团结,才能切实有效。

“医家之责任”是颜福庆作为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对公众的首次公开演讲,既是他医学思想的集中表达,也可看作是他对中国医务界的殷切期望。演讲末尾百余字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吾医界同人,定当晓然于大者、远者,不当务其小者、近者。施诊疗病,乃小者、近者之事也。其所谓大者、远者,乃对于人民尽开导启发之责,教其所不知,匡其所不逮,使健康生存之正义,充塞两间。对于医界,则以平日经验,胸中蕴蓄,为之镇中流而标正鹄,不许神圣不可侵犯之名誉,稍蒙不洁。不许有畏难心、苟安心、登高垄断心,参错其间。但欲收福国利民之效,非市政设法以补助之,不能进行无碍也。要之,蚩蚩者氓,不明此理,徒法又不足以自行也。是在政府与人民与医界,团结一气,各尽其责,庶将来四万万之圆颅方趾,受福无疆。”

“医家之责任”演讲稿发表于中华医学会会刊《中华医学杂志》第三期,时间为1916年。1931年3月6日,颜福庆应上海沪江大学医预学会之邀,前去演讲“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演讲简单回顾了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过程,重点阐述了医学教育的几个趋势,末了就学医的目的同与会者坦陈自己的看法。颜福庆说“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这是他对选择报考什么高校的学生,阐述学医的目的。

为了中国的医务事业

如果只停留在校歌头两句,那么我们的理解是肤浅的,还没有懂得这位上医创办人和词作者的意图,并且很容易与“为人民服务”混淆起来。歌词出彩在第三、四句,“可喜! 可喜! 病日新兮医亦日进。可惧! 可惧! 医日新兮病亦日进。”新疾病的产生推动了医学的进步,医术随疾病的发展而进步,这是科学家征服疾病的心态。一般的医学家和绝大部分民众会沾沾自喜,并在此驻足。但医学进步的喜悦,随即被新疾病产生的恐惧所替代。颜福庆没有满足于医学科学进步的成果,而是看到了医术的有限性和疾病的无限性,因此感到做医生的无奈和可悲,连道两声“可惧! 可惧!”这是医学科学的局限,也是人类的局限。医学与疾病,永远处于相互博弈之中;医学永远处于被动的追赶之中,疲于应命。人类只有在认识上确立预防为先的观念,才能最有效地驾驭疾病。这是颜福庆的医学哲学思想。

把“病”与“医”的关系看得如此辩证,并且坦白地承认医术的局限性,使

得这首校歌具有了哲学的高度。“病”与“医”的关系既如此,那医生怎么办?更直接地说,上医人怎么办?校歌词第二段作了说明。

“噫!其何以完我医家责任?歇浦兮汤汤,古塔兮朝阳,院之旗兮飘扬,院之宇兮辉煌。勛(勉励)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

歌词里又出现了“医家责任”4个字,与颜福庆在中华医学会首次大会的演讲有异曲同工之妙。颜福庆勤勉上医人,作医生的“责任”不在求利,不在求功,而是“正谊明道”(上医院训),在于为“亚东几千万人”提供“托命之场”。这是何等悲悯的胸怀!这是多么庄严的承诺!

由医生的责任,自然延伸到医学思想和观念。颜福庆心中的医学,不仅仅是个体医学、治疗医学,而是整体医学、社会医学、预防医学,需要全社会(政府、人民与医界三者)的通力协作才能办好。中国是农业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因此,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颜福庆更多地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农村,而中国预防医学的重点也正是在农村。在“中国医学教育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中,他指出“中国无疑急需更多的医生。大城市需要医生,内地和农村就更需要医生。我们需要愿意生活在农村、过乡村百姓同样生活,并且甘愿领取贫穷农民能支付得起报酬的医生。”

30年代中期,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完整地提出覆盖城乡的公医制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建立一张从乡村到县再到省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确保民众的健康。具体说,“在一万人口之内,设立一乡村医疗站,从事简易的医疗工作。每五到十个乡村医疗站,设一个区医疗所,从事基本的医疗卫生工作。每个县设立一个医疗中心,包括一家医院、一个简单的实验室,一个医疗行政机构,监管辖区内的医事工作。依此类推,每个省设立一个更大范围的医疗中心,监控、帮助各县医疗中心,并负责县医疗中心以外的卫生工作。在上述地方组织之上,设立一个全国的卫生行政机关,以组织和监督全国的卫生事业。在这种医疗保护体系下,才有可能合理、有效地保护所有人群的健康。为实现公医制,全国所有的医事卫生机关,应充分利用并遵循上述政策。”在80年前,颜福庆就提出这些思想,并在上医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付诸实施,反映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

实现公医制需要人才。为此,各医学院必须培训各类合格的医务人员。颜福庆认为,省立医学院应担负起这项重任,实际培训由省级医院、实验室以及县乡一级的医疗中心来承担。从事培训的医学院将由4位主任负责:理

论医学系主任(包括先修科即预科、临床前期各科);应用医学教务主任(包括内科、外科、产科、妇科等各专科),同时担任医院院长;社会医学教务主任(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学、社会学、心理学);医疗教务主任(护理学、产科学、药剂学、实验技术)。这些学校的学生应免收学费,但毕业后须在政府医疗机构内服务一定时间。

时至今日,我国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的上述理念至今不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他伟大之所在。

医学教育该怎么办

医学思想直接影响到医学教育。颜福庆的医学教育生涯是从湖南开始的。1914年,年仅32岁的颜福庆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材生胡美共同创办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Hunan-Yale Medical School;简称湘雅)并担任院长至1927年。这是美国雅礼会与湖南省政府合办的,也是中国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医学院。创办仅十余年,湘雅就在中国医务界获得了崇高的声望,被誉为是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水平医学院。“北协和,南湘雅”,湘雅如今还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医学院。

1927年大革命时期,颜福庆离开湘雅,应邀担任中国医学最高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理和管理的世界一流医学院。同年,他带着湘雅的数位高材生,带着湘雅的经验开始创设上医。1928—1938年,颜福庆一直担任这所完全由国人自办的医学院院长。中外合作办学、外国人垄断办学、国人自主办学这3种办学模式,颜福庆都经历了。从1932年开始,颜福庆又长期担任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他协助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积极推动国联卫生部来华调查医学教育,发表著名的费伯(Knub Faber)报告,极大地引起了中国医学教育家的兴趣,并成功地促使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3年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颜福庆担任该委员会主任,为当时乱象丛生的中国医学教育界制定统一的标准,努力通过政府的力量,尽力使现有的医学课程和医院达到所需的标准。

丰富的国内办学经历,加上他广泛的国际医学交流经验,使颜福庆成为当时中国医学教育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异常丰富,但有一点是关键,就是要抓住医学教育的自主权。自主权包括两方面:对外,要从外国人手里夺回医学教育主权;对内,要保持教育的独立性,避免政治的牵制。没有自主权,办一流的医学教育是一句空话。

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要向党交代自己的历史。颜福庆在总结自

己的历史时谈到两点。第一点,“中国要发展科学医学,必须国人自办,医学教育权不能操于外人”,如外籍董事退出湘雅、创办中华医学会、博医会归并中华医学会等例子都证明了这点。这是他从湘雅和协和医学院的办学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因此,他坚持中国人自己办医学院,制定中国人自己的医院标准,培养懂得中国人生理、心理的医生。第二点,医学教育要避免受“政治的牵制”。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避免教育受政治的影响,颜福庆主张“集中公私(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力量共同开拓医学事业”,为此需要创设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该董事会由上海各界名流组成,孔祥熙任董事长,颜福庆任总干事。正是依托这个董事会,颜福庆创办以上医、中山医院为核心的“上海医事中心”的理想才得以实现,经费才有了充分的保障。举例说,1927—1935年,政府拨给上医的维持费一共111万余元;而“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向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医学基金(CMB)、英国庚子赔款基金委员会3家机构争取的捐助高达93万元,几乎接近政府的拨款。1934年,经颜福庆多年不懈的争取,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向上医捐赠天文台路地产100多亩(后通过土地置换方式,颜福庆在枫林桥购买100多亩土地建成了上医新校舍和中山医院)。当年这笔地产的价值更是高达600万元。有了充足的资金,颜福庆才有足够的底气从海内外延聘到一流的教师,实行精英教育模式,选留最优秀的学生补充教师队伍。中英庚款奖学金医学名额每年仅两名,上医学生几乎每年都能拔得头筹。上医办学仅短短10年,就在医务界声名鹊起,以无可辩驳的实力,跻身国人自办医学院的翘楚地位。

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后,“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相结合”成为全国卫生政策的四大方针。这与颜福庆的医学理想几乎如出一辙,他早年倡导的西医“大众化、中国化”和“公医制”,至此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中国的医学教育进入一个重大转折关头。1949年,年过花甲的颜福庆再次出山,担任上医副院长。1955年6月陈同生出任上医院长,同年10月兼任党委书记,颜福庆和黄家驊等专家担任副院长。颜福庆与陈同生为首的上医党委齐心协力,密切合作,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上医又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

20世纪50年代的颜福庆,是作为一名医学教育大家,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为共产党建言献策。颜福庆看到了医学教育的大发展,也清醒地看到

大发展给正常教学秩序带来的冲击,这与他千辛万苦为中国医学教育界制定的医学教育标准是有所背离的,与他坚定信守的第一流医学教育标准也是有所背离的。为此,抓住各种机会,积极建言,呼吁稳定医学教育队伍,提高医学教育质量,成为他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

50年代中期,为支援国家建设,上医承担了新建重庆医学院等艰巨任务。这样大规模的调整,对上医的教学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举例说,1957年3月,上医有学生3178人,附属医院6所,病床1695张,还有护校、干校;而全院教学人员只有476人。以此有限的人力,要负担教学、医卫、研究的任务,又要提高教学质量,困难很大,因此影响到教学人员的健康。当时的统计,上医76位高级教授中,患病的就有11人,占14.5%,其中有半休、全休,也有带病从教的。颜福庆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会(1957年3月25日)上发言,陈述了上医的这些现状,认为“过去事业发展得太快,必须暂缓发展……就现有基础加以整顿提高。把提高质量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呼吁“必须巩固基本队伍,要这只母鸡能够下蛋,首先就要充实和培养它的孕育机能。”他尽力为党的医学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实事求是地向党提出建议。

1957年5月,按照九三学社中央的指示,上海分社举办高教座谈会,畅谈高校“教授治校”等学校管理制度问题。与会者都是长期从事高教的知名学者和教授。大家的发言围绕两个话题展开:第一,高等学校的管理制度有哪些自身特点,应采取何种形式?党委治校体制有哪些缺点?第二,“教授治校”有哪些优缺点?颜福庆根据他数十年的办学经验,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颜福庆赞成校长从教授中选出来。他认为,如果校长只想到行政方面,而不关心教学,那么这个人就不配做校长。校长应该掌握教学政策,不一定要科学水平很高的教授来担任校长。然而教授对行政、财务兴趣不大,要叫科学水平高的教授担任副院长或系主任,他不愿意,因为他们的兴趣和贡献是担任教学、研究工作。因此,要办好学校,教授们应多负一些责任,这是对的,但要教授们包下来,决定学校的一切,是有问题的,值得商榷。他说上医有一个院务委员会,只管行政,不管教学研究。另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却起了很大的作用,讨论与决定一切有关教学研究问题,所有教研组主任都参加,由一位副院长领导。关于挑选留校学生问题、毕业生分配问题,以后都要经过大家讨论,适当选择。校务委员会该管什么?学术委员会该管什么?应该明确,尤其应该加强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如挑选留校学生、毕业生分配、招生等问题,学术委员会应该有决定权。在改革教学方面,办教育的人,最

怕的是变得太快,今天变了,明天又变。这很不好。最要紧的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较长时期的执行,困难可以少些。不成熟的,情愿保守一点。新中国成立前上医实行过教授治校,但是目前实行教授治校制度,还值得研究。现在可以用一种过渡的办法,或者加强校务委员会,或者加强学术委员会,都可以,根本上是要多数教授参加。当前关键问题和高教部、卫生部有关系,教授们要办好学校,基本上要从上面解决问题,上面不解决问题,下面是没有办法的。建议在卫生部成立一个“医学教育委员会”,由全国30多个医学院代表组成,这样可以有广泛的代表性,卫生部才能真正了解到下面的情况,下面有了问题,也容易得到解决。

这些观点,对今天的医学教育改革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

颜福庆逝世于1970年,那时“文革”正酣。他生前立下遗嘱:遗体供医学研究。他毕生从事医学教育,引领和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成长和壮大。这位伟大的医学教育家倡导的医学教育理念、开创的医学教育事业,留给我们无穷的启发和思考。他所呼吁的“维护医生的荣誉和职业的尊严”,那是西医入华不久,百姓普遍不接受西医时代对医生的职业要求。百余年过去了,西医早已在中国确立了主体地位,但是,颜福庆“维护医生的荣誉和职业的尊严”的告诫依然是不能忘怀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参 考 资 料

1. 钱益民,颜志渊著. 颜福庆传.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 中华医学杂志. 第1期, 第3期
3. 人民日报. 1957年3月25日
4. 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和档案部藏相关档案
5. 复旦大学档案馆医科馆藏相关历史档案
6.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1954—1959 年有关高教问题座谈会记录. 上海市档案馆, C53-2-26
7. 颜福庆发表的外文资料